



三四十年代 平津文坛研究



中文系
WML

北京大学中文系
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

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
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RESS

三四十年代平津文坛研究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四十年代平津文坛研究/北京大学中文系,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编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3.1

(博雅文学论丛)

ISBN 978-7-301-21619-4

I. ①三… II. ①北…②天… III. ①地方文学史-研究-北京市-现代②地方文学史-研究-天津市-现代 IV. ①I209.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81687 号

书 名: 三四十年代平津文坛研究

著作责任者: 北京大学中文系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

责任编辑: 艾 英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301-21619-4/I·2541

出版发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www.pup.cn> 新浪官方微博:@北京大学出版社

电子信箱: pkuwsz@yahoo.com.cn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

编辑部 62756467

印 刷 者: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650mm×980mm 16 开本 25.75 印张 412 千字

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5.00 元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:fd@pup.pku.edu.cn

目 录

序:作为学术话题的“京津” 陈平原/1

上编 平津文坛漫议

另一种“双城记” 陈平原/3

“平津文坛”漫议 吴福辉/10

我对京派与海派问题的疑问 王得后/21

过度阐释:30年代鲁迅与“北方左联”关系辨析 商昌宝/25

天津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间考辨 鲍国华/37

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天津文坛现象分析 郭长保/47

“东京左联”与“北方左联” 〔日〕小谷一郎/56

“北方左联”与30年代北平中学生文艺团体 马俊江/68

相濡以沫在战时

——现代文学互动行为及其意义例释 解志熙/75

“群体心理学”视角中京派的文学活动 刘卫东/96

中编 平津作家研究

元气淋漓的“新文学之当代史”

——读林庚《新文学略说》 孙玉石 吴晓东/111

“怀废名”与叹知堂

——周作人与废名1937年之后的

师生情谊之分析 高恒文/130

“爱智者”的理性观照

——三四十年代周作人对儒家的接受 林分份/158

从“故事”到“小说”

——沈从文的叙事历程…………… 吴晓东/181

废名新诗观念的形成与 30 年代中期北平学院

诗坛氛围…………… 冷 霜/196

试论沈从文早期作品的文体演变…………… 刘子凌/212

《北洋画报》时期的刘云若研究…………… 陈 艳/227

卞之琳北平时期诗歌的复杂色调…………… 张林杰/242

现代主义地图中的北平与中国

——30 年代北平的现代主义诗歌…………… 季剑青/254

胡风的“现实主义”观与“五四”新文学的精神

——关于胡风的《林语堂论——对于他的

发展的一个眺望》……………〔日〕下出铁男/264

下编 平津报刊研究

《文学杂志》与中国现代诗学…………… 张松建/281

以最庄重最热诚的态度引导中国文艺界

——朱光潜主编天津《民国日报·文艺》…………… 商金林/305

《大公报·文艺》与京派的书评…………… 刘玉凯/336

一场关于新诗格律的试验与讨论

——梁宗岱与《大公报·文艺·诗特刊》…………… 张洁宇/348

《骆驼草》：京派文学批评的时空维度…………… 丁 文/369

射入现代文学的一束灵光

——论《益世报》与基督教文学…………… 杨爱芹/389

舞场与战场

——对天津《华北新报》禁舞言论的考察…………… 王 羽/397

后 记…………… 赵利民/406

序：作为学术话题的“京津”

北京大学与天津的学校有缘。1919年9月，蔡元培校长发表《北大第二十二年开学式演说词》，称反正办学经费不足，不如将北大工科归并北洋大学（即现在的天津大学），以便集中精力办好理科。对于如此决策，蔡先生日后没有后悔，反而很得意，在《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》中再次提及。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，国民政府命令国立北京大学、国立清华大学与私立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，第二年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。联大九年，三校精诚合作，得益于共同的学术理念，同时也因抗战前三校教授就互相兼课，自由转换，合作起来没有任何障碍。这些都是青史留名的大事，如今，京津之间的大学合作，又添了件小事，那就是北大中文系与天津师大文学院联合召开“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平津文坛”学术研讨会。

三次合作，层次不同，宗旨有异，影响更是不可同日而语。不过，我想说的是，京津之间的合作，既是历史研究的课题，也是近在眼前的事实，从长远看，二者都有很好的发展前景。我提交给会议的《另一种“双城记”》，专门谈这个问题。简要地说，就是四句话：第一，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史上，天津很重要；第二，平津两座城市关系密切，适合做综合研究；第三，“双城记”是个很好的学术视野，便于互相发现；第四，所谓的“双城记”，可以是黑白对照，形成强烈的反差，也可以是五彩斑斓，同中有异、异中有同。大略而言，前者强调对抗中的对话，后者侧重合作时的竞争。

这两天半的“平津文坛”讨论，内容非常充实。昨天上午孙玉石、王得后、吴福辉、温儒敏四位先生的专题发言，我因事没能到场聆听，实在可惜；听与会的夏君转述，令人心驰神往。前天上午在未名湖边，紧接着开幕式的是“北方左联”专题，八位发言者，不仅在史实辨析上有所推进，更重要的是，让学界重新关注“北方左联”这个长期被忽略的话题。第三至第七这五场，发表的是关于30年代京派文学、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、三四十年代天津通

俗小说等专业论文，多少都有所创获。值得庆贺的是，除解志熙、高恒文、吴晓东等已成熟的学者外，年轻一辈所撰论文也都很有分量，如中国人民大学张洁宇、北京师范大学林分份、首都师范大学张松建、中央民族大学冷霜、南开大学耿传明、中山大学李荣明、南京大学葛飞、北京社会科学院季剑青、中国现代文学馆陈艳等，一看就是训练有素，颇具学术实力。至于天津师大赵利民教授、高恒文教授与北大商金林教授、王凤副教授的精诚合作，更是此次研讨会得以成功举办的重要保障。

这回的研讨会，蕴含某种学术企图——在“天津”阅读“北京”，在“北京”观看“天津”，当然更包括将“京津”视为一体，做综合性论述，不仅作史实考辨，而且作文学/文化批评，乃至理论建构。选择“京津”这一“双城记”视角，不是一时兴起的应景之作，更不是一次性的消费行为。对于我来说，这是一个长远的研究计划，为下一代研究者预留了发展空间。因此，我寄希望于有远大志向的年轻一辈学者的积极介入与参与。目前只是一些零星的散论，但十年后必定会成为热门话题，且能出大成果。

基于如此预期，这一回的讨论会，在我看来，有以下不尽如人意处：第一，注重“文学”而相对忽略“城市”，明显缺乏对于“都市研究”的兴趣与理论自觉。第二，注重“精英”而缺乏对于大众（通俗）文学、文艺、文化的关注与理解。第三，“京津”尚未成为全国性的学术话题，除两位日本学者（埼玉大学小谷一郎教授、东京女子大学下出铁男教授）外，与会者不是在京津生活，就是从北大毕业。第四，学者更多地谈论北京，而缺少对于天津的关注与体贴。第五，京津之间文学/文化/思想/学术的互动，没能很好地展开，形不成真正意义上的“双城记”。第六，提交给会议的论文不够成熟，会场上也缺乏深入的对话与争辩。之所以有这些遗憾，很简单，我们刚起步，还不到冲刺的时候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个话题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，各位的论述也必定会日渐深入、精致、广大。

陈平原

2010年11月

上编 平津文坛漫议

另一种“双城记”

陈平原

一、为什么是“双城”

不同历史时期,诸多形态各异的城市之酝酿、崛起与衰落,乃构成中华文明史的重要章节。城市不仅聚敛权力与财富,还积聚文学与文化。虽有“首善之区”之类的说法,但即便政治上“一统天下”,也无法消弭各城市在文化上的巨大差异。在《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》中,施坚雅将农业中国划分为九个大区,每个大区发展出若干独立的城市体系,其中包括中心城市、小城市与广大乡村。进入 20 世纪,这一大区规模及城市体系的建构,更是日趋完善。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,某一中心城市的崛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张与收缩,一直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。对于治国者来说,亟需理顺的关系,除了“城与乡”,就是“城与城”。

城市之间的对峙、牵挂与竞争,包括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,其间风云变幻,莫测高深,具备多种可能性。对于具体的城市来说,政治地位由皇上/中央政府裁定,经济地位靠实力说话,只有文化地位相对模糊些,取决于众多文人学者的努力。至于城与城的关系,大略分三类:行政上的上下隶属,经济上的大小依附,文化上的“剪不断理还乱”。毫无疑问,我最关注的是既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城市之间的对峙与对话。

说到城市间的对峙与对话,最容易想到的是“双城记”。比如,谈法国城市,我们会想起巴黎与里昂的竞争;谈俄国城市,我们会提及莫斯科与圣彼得堡的角力;谈日本是东京与大阪;谈印度则为德里与孟买。中国呢? 30 年代文坛上,曾有过喧嚣一时的京派与海派之争。其实,“京海之争”之所以引起那么多人关注,而且事后一再被提及,就因为涉及的是整个城市的性

格,而不仅仅是“文学”。至于走出国门,谈国际上的“双城记”,若还是上世纪30年代,则西欧有伦敦与巴黎,中欧有维也纳与布拉格,东亚则是东京和上海。此类“双城记”的构想,随意性很大,你可以谈政治,也可以比经济,还可以论文学艺术。观察角度不同,得出的结论迥异,对这座城市的想象也就可能出现较大的偏差。

提起“双城记”,最有名的莫过于狄更斯的长篇小说。《双城记》中的伦敦和巴黎,只是故事展开的场景,作家并没有做“比较城市学”的意图。到了学者就不一样了,倘若他/她开口闭口“伦敦—巴黎”,那肯定是别有用心。有时甚至没有明说,只是暗中用力。李欧梵《上海摩登——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,1930—1945》(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1年)的《中文版序》提及:“我多年追踪30年代的上海,却无时不想到香港,这两个城市形影相随,其文化关系恐非一章《后记》可以充分表现。”李著第十章题为“双城记”,包含以下四节:“香港作为上海的‘她者’”、“怀乡:上海,作为香港的‘她者’”、“关于老上海的香港电影”以及“上海复兴”。这两座城市的比较,一不小心就影响到了社会舆论。在《寻回香港文化》(香港:牛津大学出版社,2002年)的《小序》中,李欧梵非常得意:“这个‘双城记’目前已成热门话题,我算是始作俑者之一,十几年前初创此意的目的是为我的上海都市文化研究(见《上海摩登》一书),开拓一个更广阔的比较空间,却没有料到我的‘理论’竟被急骤变化的现实所取代。”其实,可视作“双城记”并展开论述的,远不止香港与上海。

那么,城市比较,为何是“双城记”,而不是“三城记”或“五城记”呢?

法国小说家左拉创作过小说三部曲《三城记》(《鲁尔德》、《罗马》和《巴黎》),而上海文艺出版社前些年也曾刊行“三城记”小说系列。后者由上海王安忆、香港许子东与台北/纽约王德威这三位“三城居住者”各主编一本这三城的中短篇小说选,希望借此呈现同一时期上海、香港、台北这三座城市的发展轨迹。出版时间,第一辑2001年,第二辑2003年,第三辑2006年(第三辑改换编者),第四辑至今未见踪影。

至于“五城记”,我读过两篇相关文章。一是余秋雨《文化苦旅》(上海:东方出版中心,1992年)中的《五城记》,分写开封、南京、成都、兰州和广州,多感悟和抒情,很受中学生喜爱。如“开封”的开篇:“它背靠一条黄河,脚踏一个宋代,像一位已不显赫的贵族,眉眼间仍然器宇非凡。”结尾处,作者登

上古塔：“当我爬到最后一层，我真想气喘吁吁地叫一声：‘我报到，我的祖先！’”曾在台北生活六年、现居北京的香港作家陈冠中，其《城市九章》（上海：上海书店，2008年）中有一则《三城记：上海、香港、台北的流动盛宴》，有点名实不符，因其中还牵涉北京和广州。作者的大判断我很喜欢：“毫不含糊地，我说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香港、台北是中文世界的文化五都。”（第83页）

“四城记”没人说，因那念起来像“死城记”，很不吉利；“八城记”或“九城记”呢，又好像是旅行社的广告。再说，一旦“相提并论”的城市太多，读者记不住，论者也无力做深入探究。导演贾樟柯拍过一部《二十四城记》，但那不是讲述二十四座城市的故事，而是借在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原址上做房地产项目“二十四城”，表现成都的国有企业三代人的坎坷命运。

没有比较，看不出差异；太多的比较，又实在说不清楚——这就难怪那么多人喜欢口口声声谈“双城记”。

二、不同类型的“双城记”

喜欢讲述“双城记”故事的，既有政府官员，也有普通民众，更有专家学者。在“双城记”的叙述/阐释框架中，你可以谈论城市的历史文脉，也可以辨析城市的现实图景，还可以畅想未来，到底怎么做才更有意义？

首先，必须是两座各具特色但等级相当的城市，才适合做“双城记”的论述。若双方实力太过悬殊，性质及功能迥异，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竞争，无论“高攀”还是“俯就”，都太吃力了，效果肯定不好。比如，你一定要论述“纽约与潮州”的同与异，当然也可以，但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。

其次，当我们做“双城记”时，必须顾及时空因素。所谓时间，是指都市之新旧交替，比如汉魏的长安与洛阳、宋代的东京与临安，你都可以做一篇很漂亮的“两都赋”；即便不是国都，唐宋明清，诸多城市在历史大潮中兴衰起伏，导致其对话者不同，且褒贬有异。所谓空间，国际上很多大都市远隔千里，牵手结成友好城市，展开各种深入的合作与对话；而同一时期同一城市，因立场设定或论述需要，可能选择不同的对话者，比如同一个香港，可以选择伦敦或新加坡或北京或上海或台北或广州，展开“双城记”的论述。与谁“捉对厮杀”，决定了你的论述方式，还可能蕴含着某种价值判断。比如近年最为活跃的沪港比较，显然是因为上海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。

再次,谈论城市,为何需要成双成对?现实生活中,之所以盛产“双城记”,就因为当事人认准在“对镜”过程中,互为他者,更容易有所发现——借了解对方,确定自家立场,力争扬长避短。政治家之谈论“双城记”,大都有赶超对方、压倒对方,争夺话语权的意味;学者不一样,我们只是借助此叙述框架,获得对照与比较,还有深入思考的空间。一旦两城并列,必定有比较,有褒贬,所谓“一碗水端平”,只是理想境界;不过,在我看来,好的“双城记”,不该争风吃醋,你死我活,而是相辅相成,相得益彰。

最后,也是我最想说的,世界上没有两座城市是完全一样的,所谓的“双城记”,可以是黑白对照,形成强烈的反差;也可以是五彩斑斓,同中有异、异中有同。大略而言,前者强调对抗中的对话,后者侧重合作时的竞争。如果以30年代的文坛为例,前者便是京海之间的对峙,后者则是平津之间的互补。

这当然取决于经济结构、语言文化以及历史传统,但似乎也与城市间的距离有关。北京与上海距离1463公里(火车,下同),上海与香港距离1991公里,有足够大的腾挪趋避的空间,容易做成对峙/竞争的大文章。另外一类“双城记”,距离就近多了——北京至天津135公里,苏州至杭州160公里(公路),广州至香港173公里,上海至南京301公里,成都至重庆315公里,不说“近在咫尺”,但确实相距不远,历史上以及现实中,多以合作/互补为主,当然也包含竞争。这两种类型的“双城记”都很重要,但针对目前中国学界的现状,我更愿意谈合作而不是对抗、互补而不是竞争的“双城记”——比如京津、沪宁、成渝、苏杭或者穗港(省港)。后一类“双城记”,反差不太大,因而不太耀眼,但其实更重要,不该被我们忽视。

北京与天津,这两座大城市离得这么近,但无论行政区划还是文化性格,都各有其特性,不可能也没必要合并。因此,关注一百五十年来京津这两座举足轻重的大城市,在文化上如何对话、呼应与竞争,特别有意思。以我粗浅的了解,晚清一直到40年代末,这两座城市在文化上呼应得很好;反而是新中国建立以后,人才变成单位所有,新闻出版以及文学艺术等,双方都得各搞一套,往来反而少多了。这有点可惜。近年政府提倡京津冀合作,更多考虑的是经济因素。其实,教育、学术、文化更应该这么做——起码,历史学家首先应该将京津作为“双城记”来综合研究。

三、作为一种学术思路的“京津”

在“京海之争”的论述框架中,天津的地位及作用被严重低估。我们都知道,挑起京派与海派之争的,是沈从文的《文学者的态度》。此文发表在1933年10月18日的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上,因其偏袒京派而贬抑海派,引起上海作家不满,于是展开一场火药味很浓的论争。第二年1、2月份,沈从文又在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发表《论“海派”》和《关于“海派”》。当上海的作家群起反击,攻击京派之依附官府因而同样缺乏独立性时,似乎没把作为“阵地”的天津考虑在内。当然,这只是个小插曲;我想引入的,是近现代中国文化史上,北京与天津之间关系如何密切。

“天津作为一个具有完整意义的都市,是在明清时期形成的”(参见来新夏主编《天津近代史》,第4页,天津:南开大学出版社,1987年)。但因其与作为帝京/首都的北京离得太近,常被不恰当地忽略了。就以当下来说,虽说是老牌的直辖市,比起上海和重庆,天津面目模糊,不太容易吸引公众的目光。不仅今天,几乎历来如此。可天津不仅是拱卫京师的大门,还是北方最重要的通商口岸、洋务中心,很长时间里,其工商业及消费水平平均比北京高。至于文化建设方面,学校、报业、戏剧、曲艺等,也不比北京逊色。清末民初之开通民智、呼唤变革,天津的《国闻报》(1897,创刊时间,下同)、《大公报》(1902)、《庸言》(1912)、《益世报》(1915)可谓赫赫有名;至于《醒俗画报》(1907)、《人镜画报》(1907)、《北洋画报》(1926)对于政治时事、百姓生活以及文化娱乐的关切,《春柳》(1918)之提倡南北话剧融合,同样值得表彰。新文化运动时期,北京、天津的青年学生多有交往,南开新剧团对于西方近代话剧的推介,更是走在北京前面。30年代的京派文学、“北方左联”,平津两地多有沟通;至于北派武侠小说家,如还珠楼主(李寿民)、宫白羽、王度庐、郑证因、朱贞木等,都是30—40年代活跃在天津与北平,并得到广大读者的拥戴的。

可我最想说的,还是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对平津文坛的意义。英敛之1902年创办的《大公报》,是当年北方最重要的新闻媒体。1926年胡政之、张季鸾、吴鼎昌的新记《大公报》,更是对平津的政治、文化、教育等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它开辟众多专门性副刊,涉及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艺术、

医学、军事等,请北平等地的大学教授主持,办得风生水起。从1928年吴宓编“文学副刊”,到1933年杨振声、沈从文编“文艺周刊”,编辑方针有很大改变,但都是借用北平的作者群,后者连通讯地址都写“北平西单西斜街55号甲”(那是杨振声的家庭地址,真正的编者沈从文居住于达子营28号)。换句话说,这“文艺副刊”就是外包的“活”,北京编辑,天津印制并发行。1935年刚从燕京大学毕业的文学青年萧乾,接手编副刊,更是常跑北平组稿并征求意见。半个世纪后,萧乾撰《一代才女林徽因》(《读书》1984年第10期),描述当年的情境:“一九三五年七月,我去天津《大公报》编刊物了。每个月我都到北平来,在来今雨轩举行个二三十人的茶会,一半为了组稿,一半也为了听取《文艺》支持者们的意见。小姐(指林徽因——引者注)几乎每次必到,而且席间必有一番宏论的。”

30年代的北平文坛,废名编《骆驼草》、叶公超编《学文》,虽则美丽,都是昙花一现。至于朱光潜的《文学杂志》,1937年5月才出第1期。对于京派文人来说,天津的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是最为重要的阵地。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,没有天津的《大公报》,就没有30年代的京派文学。正是天津、北平这两座城市的文化人通力合作,方才成就了京派文学这一奇葩。至于1936年文坛上的两件大事:评选《大公报》“文艺奖金”,评委主要是北平的作家和批评家;编《〈大公报文艺丛刊〉小说选》,则干脆委托北平城里“太太的客厅”中美丽而睿智的女主人林徽因来做。

萧乾在《我与天津》(《萧乾全集》第四卷,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05年,第682页)中称,当年到天津后,报馆的朋友不多,文学朋友却不少:“曾在北平沙滩汉园公寓住过的三位诗人——何其芳、卞之琳和李广田,当时都在八里庄南开中学教书。另外还有毕厥午以及巴金的哥哥李尧林。章靳以和万家宝(曹禺)那个时候恰好也在天津。”这里提及的,主要是京派或倾向于京派的文人。其实,同一时期的平津,不仅有京派文学,还有“北方左联”。孙席珍、陈沂、方殷等人的文章都提及“北方左联”主体在北平,但有个天津支部(参见《左联回忆录》下册,第497、573、627,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82年)。张香山《天津左联的片断回忆》称,“天津左联”成员除了给文总办的综合性月刊《天津文化》写稿,还在《大公报》副刊《小公园》(曹世瑛编)上发文章(参见《左联回忆录》下册,第654—659页)。与上海“左联”多著名作家不同,“北方左联”多年轻学生,文学成就不高,杂志(北平刊行的

《文学杂志》、《文艺月报》、《科学新闻》以及天津创办的《当代文学》影响也不大,更多地是一种年轻人的政治热情。但作为一种政治性很强的文学实践,平津两地文学青年的热血及激情,还是值得后人追怀以及充分肯定的。

之所以需要“平津”这样的“双城记”,一是当初本就多有合作与互补,二是便于互相发现——在天津阅读北京,在北京观看天津,当然更包括将平津视为一体做综合论述,这都是拓展学术视野的绝佳途径。在我看来,不仅应该好好探究政治史或文化史上的“京津”,学界还可以在“双城记”的视野中,深入思考明清的苏杭以及民国史上的穗港(省港)、沪宁、成渝等。这些结构相似、多有合作与互补的“双城”,更适合于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、思考与论述。

2010年11月12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

(初刊《读书》2011年第1期)

(作者单位:北京大学中文系)

“平津文坛”漫议

吴福辉

“平津文坛”的概念,按理顺着“平津”的说法天然就是成立的。而且此概念内在地包含着时与空两面,空间不用说了,时间方面即现代以来“北京”改称“北平”有多久,这个当年的中国北方文坛便有多长——大致从1928年到1949年的北平、天津两地的作家群体、报刊及出版物的文学生长状况等,就都涵盖在里面了。30年代上海是全国的文学中心,北方主要有京派文学等。京派活动的范围包括天津,最明显的例子便是作为“京派重镇”的《大公报·文艺》副刊,由沈从文在北平编,报纸却是在天津出的。到了40年代,平、津均沦于日寇铁蹄之下,现在谈“沦陷区文学”一般是指东北沦陷区、平津沦陷区和上海沦陷区这样三块。这些都不会有什么争议,只是很久不大重视罢了。

不重视将平、津文坛合一,往往与人们的视线被“中心现象”遮蔽,来不及顾及、细化其他地方有关。比如一谈到“五四”文学,北京是发祥地,北京大学中文系、《新青年》作家群是焦点;一说到1930年以后的文学,中心转移到了上海,“左联”在上海,海派文学在上海,自然眼睛都盯在那儿。本来从晚清的政治地图看,北京是京畿重地,天津卫是保护京畿的门户,京津两个城市一体,并有合理分工(一个是政治城市,一个是商业城市;一个大陆城市,一个沿海城市)。到了全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都南移之后,平津地区便一起失落。旧的文坛打散后,该如何重新聚集,就演变为自备一格的文学环境了。

一、京派—“北方左联”—北派通俗:文学形态多样的文坛

京派形成了能自立于强大的上海左翼文学之外的“纯文学”,是平津文

坛最显著的特色。那时在中国任何地区都不可能构成如此的纯文学创作条件,这已经有了许多研究。不过京派的纯文学并没有那么“纯”。中国没有真正的形式主义的写作,京派作品大部分具有温和的社会性。因为纯文学创作是没有普通市民读者市场的,依托的是校园:从校园精英文化生长出来,也基本由校园读者来消费,循环不已。所以当年的京派作家由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燕京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辅仁大学等校的师生组成,他们多半不等着稿酬买米下锅,可以相对从容地写作。1933年沈从文辞去青岛大学教职到北京参与杨振声编辑教科书的班子,与张兆和结婚,接编天津《大公报·文艺》,三事联办,到10月就在自己编的副刊上发表《文学者的态度》,批判“玩票白相”的上海文人,引发了“京海论争”。第一个在上海写文章回应北方发难的苏汶(杜衡),在《文人在上海》里就认为一味指责上海文人“爱钱,商业化”是并不公平的,因这边“不容易找到副业(也许应该说‘正业’),不但教授没份,甚至再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”,结果是“急迫的要钱”,“一完稿便急于送出,没有间暇搁在抽斗里横一遍竖一遍的修改”^①,暗指京派作家大部分在大学任教,不像海派作家牢牢依靠稿费活着的状态。这对于一定的写作态度、作品品质、工作方式,对于写什么和怎样写,确实有举足轻重的影响。这一点杜衡说的倒是真话。

我们还可以举话剧在平津的情况来补充说明之。作为北方话剧运动中心的天津南开学校,远在晚清就由校长张伯苓带头发动,于1914年成立南开新剧团,几十年坚持演出,其宗旨为“练习演说,改良社会”,以提高学生素质为主。张彭春在美国学成戏剧归来后更对新剧团做大力的推进。到1930年新剧团演出高尔斯华绥(英)《争强》;1934年重排保留节目《新村正》;1935年隆重推出莫里哀(法)《财狂》(即《怪客人》),曹禺任主演,林徽因任舞台美术设计。但这些都是依托校园的,与处于话剧中心地的上海话剧演出团体不同。有趣的是,1935年曹禺的《雷雨》在国内和日本首演,到第二年职业性“中国旅行剧团”终于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连演三个月,场场爆满,标志了中国话剧商业演出的成功。几乎同步,曹禺本人也在参加母校南开新剧团的演出,不是校庆游艺,便是慈善赈灾,票价一般2角起(对本校游艺演出经常是免票的),实际不计成本(如竟规定“视线不周之座位,均行

^① 苏汶(杜衡):《文人在上海》,《现代》第4卷第2期,1933年12月1日。